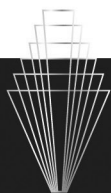




近代中國與東亞研究系列 之一

1920年代之中國



政大出版社
Chengchi University Press

白大
歷史

1920年代之中國 / 李在全等作；劉維開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政大出版社出版：政大歷史系發行, 2018.12
面：公分（近代中國與東亞研究系列；1）
ISBN 978-986-96304-7-4（平裝）

1.中國研究 2.文集

574.107

107021928

近代中國與東亞研究系列之一

1920年代之中國

主 編 | 劉維開
作 者 | 李在全、佐藤純平、郭玫珂、羅皓星、朱紹聖、
許峰源、施純純、馬思宇、侯嘉星、趙席叟、
陳皓昕、方慧雯、皮國立

發行人 郭明政
發行所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出版者 政大出版社
編輯助理 楊善堯
執行編輯 林淑禎
地 址 11605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
電 話 886-2-29393091#80625
傳 真 886-2-29387546
網 址 <http://nccupress.nccu.edu.tw>

經 銷 元照出版公司
地 址 10047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18號5樓
網 址 <http://www.angle.com.tw>
電 話 886-2-23756688
傳 真 886-2-23318496
戶 名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郵撥帳號 19246890

法律顧問 黃旭田律師
電 話 886-2-23913808

初版一刷 2018年12月
定 價 400元
I S B N 9789869630474
G P N 1010702451

政府出版品展售處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104臺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 五南文化廣場臺中總店：400臺中市中山路6號
電話：886-4-22260330

尊重著作權・請合法使用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目次

導言	001
劉維開	

1920年代的政治

- 1 北伐前後的微觀體驗：
以居京湘人黃尊三為例..... 013
李在全
- 2 圍繞清末民初浙江省財政的三角關係：
浙江省議會、省政府和中央政府 047
佐藤淳平
- 3 1920年代北京政府與上海租界之關係：
以會審公廨為中心..... 073
郭 まいか（玫珂）

1920年代的對外關係

- 4 1920年代中期中日兩國實業界團體的往來：
以1926年上海實業團為例 093
羅皓星

- 5 日本外交官重光葵眼中的1920年代前後之中國...115
朱紹聖

- 6 許繼祥捍衛南海主權的努力（1920-1928） 151
許峰源

1920年代的社會群體與觀察

- 7 廖仲愷對中國社會改造的看法（1919-1925） .. 173
施純純

- 8 中共早期黨團研究（1921-1927） 201
馬思宇

- 9 近代中國農業高等教育與農業化學知識的發展 . 235
侯嘉星

1920年代的性別與身體

- 10 革命、政治與愛情：以陳璧君及汪精衛
為中心之探討（1908-1925） 259
趙席簋

- 11 1927至1936年服裝產業發展與時尚潮流變遷：
以上海為中心 291
陳皓昕

12 五四前後男性話語權下的「新性道德」 321
方慧雯

13 當「營養」成商品：
維他命在近代中國（1920-1931） 345
皮國立

導言

劉維開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歷史的轉折有其延續或斷裂，從近代中國發展的軌跡來看，1920年代是一個革命狂飆的年代，也是一個思想制度新舊交替的年代，具有承先啟後的意義。1920年代發生的幾個事件，在當時或許有大小不同的反應；中國共產黨成立、北京政變溥儀被逐出宮、孫中山北上逝世、國共合作與分裂、五卅慘案與反帝運動蜂起、國民革命軍北伐、國民政府奠都南京等，從後來的發展，則是直接或間接帶動政治、軍事、社會、經濟、教育、文化等方面的變革，影響中國近代歷史進程甚鉅。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長期致力於中國近現代史及近代中外關係史等領域之研究，並與國內外學術單位合作進行各項學術活動。2014年起，歷史系研究部同學自發性成立「中國近現代史讀書會」，企圖藉由讀書會的相互討論，進一步推動中國近現代史研究。2015年，讀書會在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的支持下，舉辦「百變民國：民國史百年來的演進與變革」工作坊，對民國史研究之軍事、地方建設、外交、文化、財政、宗教等各領域，進行深入的交流與討論，與會者咸感收穫甚豐。有鑒於此，讀書會成員決定凝聚研究焦點，以年代為斷限，探討民國史相關問題。計畫以三年時間，由1920年代開始，分別進行1920年代、1930年代、1940年代之中國學術研討會，邀請更多有志於民國史研究的青年學者參與，以期透過會議論文與討論，展現出對民國史多元的研究方向，並促進彼此間的交流。

「百變民國：1920年代之中國」學術研討會於2017年2月11、

12 日，在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舉行，有來自臺灣、中國大陸與日本青年學者 30 餘位參與，發表論文 29 篇。會議採青年學者提報論文，資深學者評論，與會學者共同討論方式進行。論文經過評論、討論及會後審查、修改，共有 13 篇收入本論文集。依論文性質分為政治、對外關係、社會群體與觀察、性別與身體四個主題。

第一個主題「政治」，分別由個人與國家、地方與中央、租界與司法三個方向切入。廣州國民政府以推倒北京政府為目標，指揮國民革命軍展開北伐，是 1920 年代的重大事件。由於「北伐」二字內含從南方立論的意涵，長期以來，有關北伐史的研究，多以軍政勢力消長為主要內容，也多是從南方角度進行探究。李在全的〈北伐前後的微觀體驗：以居京湘人黃尊三為例〉，以黃尊三日記為主要史料，探討一位在北京工作的湖南人，如何觀察這場大變局，以及如何在變局中求生存。作為北京政權的邊緣人，黃尊三對北京政府固然沒有多少認同感，對於南方政權也沒有多少嚮往與欣喜。戰爭造成了他在南歸或留京選擇上，「歸則無家，留則無食」的兩難窘境。黃尊三的微觀體驗表明，北伐前後的南方與北方，很難說存在相互轉換、零和博弈的現象；用「南北新舊」詮釋北伐史，效力與不足並存。李在全所探討的雖然是一個個案，但是在變局下，任何個人選擇的兩難基本上是一致的，「歸則無家，留則無食」的窘境，同樣出現在 1949 年另一次政權交替的變局中。佐藤純平的〈圍繞清末民初浙江省財政的三角關係：浙江省議會、省政府和中央政府〉，以浙江省之財政問題與政治動向之間的關係為主軸，探討浙江省議會因為國地兩稅衍伸出能否審查國家預算問題、省議會如何監管地方財政，以及省議會企圖藉由省憲的「財政」條文規範地方財政，藉以理解北洋政府時期中央政府、地方行政首長和地方議會三者之間所形成的三角關係，同時對於浙江省的省自治運動結束，提供財政角度的觀點。由於清代以來浙江省被中央政府攤派數額較多的解協款，晚清的諮議局和民國以後的省議會均十分關注國家預算和地方預算的劃分。1914 年 2 月省議會被迫解散，但是 1916 年臨時約法恢復後，重開的浙江省

議會仍然建議國會，由省議會優先審查國家預算，予以增刪修改之說明後，陳請國會，以備參考。這個方式以擴大地方預算的範圍和對國家預算發揮更大的影響力為目標，展開了相應的行動，並且獲得省政府的支持。特別是直皖戰爭後，浙江都督盧永祥和直系為中心的北京政府之間的關係惡化，上述傾向愈發明晰。在這個背景下，1920年代浙江省制訂了《九九憲法》、《三色憲法》等省憲草案，其中均有關於預算分配之規定，並以削減軍費和確保教育經費、實業經費等為目標。但是，省議會主張的地方預算擴大，實際上侵犯了省政府的權力，府、會關係趨於緊張。另一方面，省議會在憲法草案中要求削減軍費，將影響盧永祥的權力基礎，省憲的施行自然無法得到盧的支持。浙江省的省自治運動也在這樣的情況下遭到終結。郭玫珂的〈1920年代北京政府與上海租界之關係：以會審公廨為中心〉，運用英國國家檔案館（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的外交部檔案（FO228），探討北京政府外交部如何通過會審公廨，利用中國的各種新法律，間接地影響租界的內部社會，與租界當局進行博弈。1921年7月，北京政府與德國簽訂《中德協約》後，德國人在中國不再享有領事裁判權，雖然由於租界外國人的反對，未能及時將所有德國人的管轄權集中到中國司法體系內，但是明確地促進了北京政府外交部的租界政策，並且引起租界的逐步變化。另一方面，受到這個問題的影響，會審公廨的會審官們開始試圖嚴格管理外國人的國籍問題。1924年8月，北京政府外交部向公使團建議，不僅在中國人之間的民事案件，而且在無治外法權外國人與中國人之間發生的民事案件，都應由中國會審官審判。公使團認為外交部的建議係基於條約而來的主張，外國方面不可堅執反對意見，但是考慮到租界為「特殊地區」的情況，還是需要維持部分案件的會審權。最終，中外雙方達成妥協：在無治外法權國家外國人與中國人之間，或是兩造都是無約國外國人之間發生的民事案件中，外國人沒有會審權。作者表示：「北京政府確實在瓦解『租界代表外國人利益』這一原則，最終廢除對於無約國外國人案件的會審權。於此，不管這些外國人住在租界裡，他們的司法地位基

本上被置於北京政府的管轄之下。」

第二個主題「對外關係」，重點在中日關係的討論，以及南海主權的維護。羅皓星的〈1920 年代中期中日兩國實業界團體的往來：以 1926 年上海實業團為例〉，以實業界為中心，探討中日兩國如何在經濟上尋求合作，進而共同謀取各自之利益。作者以 1925 年的上海實業團訪問為例，認為訪問的過程中受到諸多因素影響，使得整個行程失焦，無法達成雙方想要達到的「中日親善」的最終目的。但是，通過這次實業團的訪問，可以注意到日華實業協會在其中所起的促成作用。他們延續了自明治以來日本實業界在中國的人際網絡，並持續維持了這種關係。而日華實業協會不只接待實業界人士，亦接待政界人士。1927 年，蔣介石下野訪日期間，在日本會面的人士，除了接收孫中山過去的人脈外，亦建立他在日本新的人脈。而澀澤榮一等人就接見蔣介石，並大談中日兩國如何共存共榮。這種關係一直延續至 1937 年兒玉謙次的日本訪華視察團，仍在持續產生作用。朱紹聖的〈日本外交官重光葵眼中的 1920 年代前後之中國〉，從重光葵（1887-1957）的角度，探討他如何認識 1920 年代的中國，以及在實際參與對華交涉的過程中，他的對華認識產生了何種轉變。重光葵在 1933 年出任外務次官前的 10 年間，主要從事對華事務，對當時的中國有著長時間的關注，由他所留存的相關資料及外交文書中的記載，對於理解一位日本外交官如何認知此時中國局勢變化，具有重要的價值。重光葵在 1921 年結束巡視南洋群島的任務後，隨即展開一場將近兩個月時間的旅程由南至北進行對中國的考察。在這段旅程中，他認識到在蘇聯的支援下，無論是南方的孫中山，抑或北方的馮玉祥，隨時都有可能走向左傾的道路，對於維護日本在中國東北的利益上顯然是充滿危機的。但是孫中山在東北問題上願意與日本妥協的態度，也讓他意識到此時的日本政府與國民黨之間仍然存在著合作的可能性。於是拉攏中國民族主義力量倒向日本、遠離蘇聯，形成他在處理中國事務上的主要方針。1927 年田中義一組閣後，重光葵從駐華使館被改派至德國柏林的公使館任職，至 1928 年北伐結

束後，日本調整其對華政策，他再度派赴中國，任上海總領事，並在駐華公使佐分利貞男自殺以及小幡西吉出任公使遭拒後，代理公使一職，於1930年與國民政府簽訂《中日關稅協定》。九一八事變發生後，重光葵一改過去對華讓步的姿態，將九一八事變的責任全部推卸給中國政府，並以蔑視的態度觀察中國局勢的發展，與同時在日本國內高漲的民族主義浪潮同流。作者認為重光葵對中國認識的轉變過程，實際上反映出1920年代中日關係的變化，成為理解同時代中國局勢變遷的一面鏡子。許峰源的〈許繼祥捍衛南海主權的努力（1920-1928）〉，利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典藏《外交部檔案》，以及相關南海檔案彙編與報刊資料等，以北京政府海道測量局局長許繼祥作為考察的軸線，探索中國在1920年代落實東沙島海事建設、強化海權，以及維繫南海島嶼主權之努力與遭遇的挑戰。自清末以降，東沙島與西沙群島長年為廣東管轄，日商違法勾結華商開採磷礦之例屢見不鮮，爭議頻起。1925年12月，海岸巡防處在東沙島無線電氣象臺工程完工後，許繼祥鑒於島嶼行政管轄權歸屬廣東，但島上並無居民，提議將島嶼劃歸海軍部管轄。1926年5月，北京政府國務院決議東沙島歸由海軍部管轄，並派海軍人員進駐，之後，再將同屬南海區域之西沙群島亦劃歸海軍部管理。海軍部經營東沙島與西沙群島事務後，採取相對嚴格方式取締日方非法行徑，以鞏固島嶼主權。燈塔、無線電與氣象臺是南海島嶼重要的海洋事務建設，許繼祥除在東沙島完成氣象臺、無線電臺與燈塔之建置，亦著手西沙島燈塔、無線電與氣象臺之建置，最終卻苦於國家財政困乏，無法落實是項計畫。然而，許繼祥落實東沙島燈塔與無線電氣象臺建設，以及西沙群島海洋事務建設之設計藍圖，後來也成為南京國民政府經營東沙島海事設施，開展西沙群島無線電氣象臺建設的根基。

第三個主題「社會群體與觀察」，有三個議題：廖仲愷對中國社會改造的看法、中共早期黨團之探討、近代中國農業高等教育與農業化學知識的發展。施純純的〈廖仲愷對中國社會改造的看法（1919-

1925)》，分析廖仲愷在五四時期和國民黨聯俄容共過程中對於中國社會改造的看法。廖仲愷是孫中山聯俄容共政策的支持與執行者，這與他對中國社會改造的看法有關。作者認為無論在五四時期或聯俄容共期間，廖仲愷始終相信社會中的階級分化乃至於階級鬥爭，均源自產業革命後的社會。中國遭遇帝國主義侵略的現實，以及尚未完全工業化的處境，使得中國有餘裕借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也使得「中國革命是否需要階級鬥爭」成為爭議的問題。在五四時期，廖仲愷主張以直接民權修正西方代議制度的缺失，從政治上的改善避免西方階級鬥爭在中國的重演。在聯俄容共期間，廖仲愷主張各階級聯合以進行反帝反軍閥的國民革命，轉而加強黨的組織力量、民眾動員以及黨軍的訓練，發展革命的「強力」，並以公共團體與政府的聯繫，處理階級之間的衝突。因此，廖仲愷的社會改造需要民眾參與，但相較於五四時期訴諸民眾直接掌握政治權力以影響政策，聯俄容共期間的民眾參與，更多是使民眾服從黨和政府的領導，執行黨和政府的決策。廖仲愷在民眾與黨、社會團體與政府連結的問題上，雖然試圖兼顧民眾利益與革命需要，但仍是黨與政府主導民眾的命運和未來，以及掌握社會團體的動向和組織。民眾作為革命載體的優先性，呈現了廖仲愷既想要讓民眾掌握權力、又必須使其服從主義、參與革命的兩難處境，也反映出革命者處於中國 1920 年代的政治、經濟困境和國際壓力之中，想要改造社會的限制與困難。馬思宇的〈中共早期黨團研究（1921-1927）〉，以黨團機制在中共早期發展過程中所起的關鍵作用，探討中共在 1921 年至 1927 年的七年間，如何從一個研究小團體成為群眾性政黨。黨團是指中共在黨外組織與群眾組織中進行活動的祕密機關，圍繞它而衍生出的一套組織機制和行動規則，是為黨團機制。該機制可追溯至 19 世紀上半葉的英國議會黨團，列寧將這一個制度移植到蘇俄布爾什維克，並將其活動範圍擴大到蘇維埃一切社會團體，藉以確保黨在政治上的領導地位，成為列寧主義政黨的一種獨特機制。黨團機制對應著中共與黨外團體之間的差序格局。在這一格局中，中共居於核心地位，而國民黨、工會、農

會、學生會以及各界聯合組織，按照階級劃分，親緣性和重要性向外依層遞減，形成一張環環相扣，層層深入的蛛網結構。而黨團就是中心射向四方的蛛絲，勾連革命政黨與群眾團體。中共既可派人滲透到各群眾團體，貫徹黨的政策，以有形化無形；也可利用黨團運作，造成群眾團體自下而上回應，化無形為有形。黨團隱於群眾團體之中，又超乎團體之外，通過對群眾團體中組織、宣傳、外聯等環節，掌握群眾團體乃至群眾運動的主動。中共和青年團共同推動學生組織的政治改造，使其成為政黨運動的一部分。而藉由以學生聯合會為代表的各群眾團體合力推動，中共和青年團得以在各界聯合會中遍設黨團，掌握主動，從而獲得了群眾運動的領導權。在五卅運動前，中共和青年團仍是小黨、弱團，但是中共巧妙利用黨團機制，在參與領導五卅運動過程中，加以彌合，不但使中共、青年團在群眾團體中站穩腳跟，更將運動導向革命方向。作者指出，中共和青年團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在組織、行動、宣傳等方面均有修正，為日後中共開展群眾運動奠定基礎。黨團機制亦得以逐漸發展、完善，而成為中共政治體系中獨特且重要的黨組制度。侯嘉星的〈近代中國農業高等教育與農業化學知識的發展〉，利用民國時期與農業有關的大專院校學報論文、一般雜誌文獻等，從農業化學知識之引介與應用出發，探討十九世紀末至 1920 年代間，農業化學知識傳入、建立高等教育的歷程。自清季新政開始，各省相繼建立農林學校，這些學校在 1920 年代前後陸續發展成為新式農業科學教育的基地，包括北京大學、中央大學、金陵大學及中山大學等，設置農業化學相關科系，同一時期，政府當局及民間業者也意識到農業市場對化學品的渴求，其龐大商機吸引資本家投入。就此而言，農業化學作為現代部門參與農業生產，並不僅是對農民帶來生產工序上的變革，同時帶來的是新式知識、產銷配售關係、生產組織以及政府角色等種種改變，使得現代部門得以更深刻地影響農村。這些過程與今日中國經濟轉型有異曲同工之處，所以探討近現代中國的農業化學知識的發展，實際上也是試圖回應如何理解型塑今日中國社會樣貌的種種驅力。

第四個主題「性別與身體」，著眼於女性角色的探討、服裝產業發展與時尚潮流變遷、男性話語權下的「新性道德」，以及營養食品在近代中國的發展等問題。趙席復的〈革命、政治與愛情：以陳璧君及汪精衛為中心之探討（1908-1925）〉，以陳璧君與汪精衛的早年行事活動為主軸，探討一個作為近代中國重要政治人物配偶的角色。作者認為陳璧君作為汪精衛的同志、妻子，她將愛戀與革命合一，婚姻亦和革命結合，與汪精衛是一種生死以之的同命鴛鴦；隨著汪精衛的仕途浮沉，陳璧君也與之同進退、共患難。陳璧君在這個時期，很稱職的扮演「男性政治人物背後的賢內助」角色，但她的參與程度很高，主動性與決策部分卻有限，除了婚前自主加入革命行動外，其他時候，她的角色只是輔助與隨同。陳皓昕的〈1927 至 1936 年服裝產業發展與時尚潮流變遷：以上海為中心〉，以 1927 至 1936 年的審美轉折期為研究對象，探討上海的服裝產業發展與時尚潮流變遷。作者認為上海在這個時期正經歷商業和觀念上的重大變化，商業上，以百貨業為主要對象的各式消費興起，促成消費革命；觀念上，新富中產階級生活產生重大改變，其中以女性觀念變遷最為矚目。全文從「近代中國服裝消費方式的轉變」、「民國成衣業概況」，以及「服裝銷售與引領時尚」三個方面，分析服裝產業發展與時尚潮流變遷的關係。方慧雯〈五四前後男性話語權下的「新性道德」〉，以近代思想脈絡為依據，期刊雜誌為主要材料，著眼五四時期「新性道德」的「社交」、「貞操」、「戀愛」、「婚姻」及「優生學」等內涵，探討五四「新女性」是如何形塑生成，又依據何種形式、身分，被吸納至近代國族主義之論述。作者認為在複雜多變的五四時期，婦女雖然看似有著更多的表現機會，但是仍然無法掙脫男性所列定的「活動框架」，難得真正的自由。近代中國的「婦女解放」之路，女性其實一直深陷在「自我犧牲」當中，五四男性依據性別權力，以滿足自身欲求、家國民族理想；及至抗戰時期重塑「女國民」身分，後至毛澤東主導中國建立「女同志」形象，女性實依據時代發展，其形象、內涵不斷被變更以貼合社會趨勢。其中的「順從」與「舒心」，可

以說是「女性」長期以來應有的特質。皮國立的〈當「營養」成商品：維他命在近代中國（1920-1931）〉，以維他命傳入中國後如何由「藥品」成為商品的過程為重點，討論維他命在近代中國發展的軌跡。維他命知識剛傳入中國時，與醫療疾病有相當之關係。人們在1920年代一邊探討維他命的種類，也一邊關注維他命可以治療何種疾病，如此的知識呈現，其實更早於維他命成為商品之現象。1920年代作為「商品」的維他命，至少有魚肝油、維他命補充劑或添加至食品內，如牛肉汁等，在維他命知識剛進入中國時，有些魚肝油的廣告不一定會強調它添加了維他命。但是當維他命的知識漸漸被建立之後，如魚肝油等商品廣告就不斷強調它含有「維他命」，而且把所有當時一般民眾懼怕的疾病預防與治療，不論中西新舊，都賦予在商品的廣告中，凸顯醫學理論知識和商品療效二者之間的巨大差異和錯置。從維他命的歷史，可以使我們對現代食品和藥品交會下「衛生」的知識史與內涵，有一個更全面的理解。

關於1920年代中國的學術研究不在少數，也曾經舉辦過以1920年中國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會後出版過同名的論文集。但是隨著時代的演變、知識的流通，以及資料的大量開放，現階段對於1920年代中國的研究，有著較以往更佳的条件與環境。收錄在這本論文集中的各篇論文，雖然主題各異，但是所呈現出的是青年學者對於1920年代中國研究的成果，與年輕世代對於1920年中國的認識。當然論文集中的主題無法含括1920年代中國的所有面相，但是立基於前輩學者以往的研究成果，若干主題，如維他命在中國如何從藥品成為商品、農業化學知識的傳播與應用、中共如何運用黨團進行擴張、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南方人如何看待北伐等，可以說具有一定程度的創新與學術貢獻。「中國近現代史讀書會」在1920年代之中國學術研討會舉行之後，發展為「近代中國與東亞研究群」，希望進一步擴大研究視野，並繼續舉辦1930年代、1940年代之中國學術研討會。《禮記·學記》：「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相信研究群成員透過切磋與交流，一步一步前進，應該會有更豐碩的研究成果。